

人生樂在相知心

許媛婷

——談李壁注《王荊文公詩》

王安石《明妃曲》詩云：「漢恩自淺胡自深，人生樂在相知心」，歎昭君絕色卻未得漢君之識，因而遠嫁胡兒，有感於人生難得知己之嗟。時隔百年，李壁成了介甫詩注的第一人，除了典故出處外，注文處處可見安石的雄才抱負、憫人情懷、人物褒貶，以及生活情趣，其靈動清晰，聊可慰安石之感嘆。

王安石其人

在北宋的政治史上，王安石（一一〇一—一〇八六）絕對可以稱得上是一位關鍵性的重要人物。根據《宋史》記載，安石字介甫，號半山，撫州臨川人，其：「少好讀書，一過目終生不忘。其屬文動筆如飛，初若不经意，既成，見者皆服其精妙。」可見他的才學見解係自幼養成，無形中造就日後議論高奇，果於自用的政治性格。仁宗慶曆二年（一〇四二）時擢進士第，當時他才二十二歲，年少得志。後

來神宗即位，安石上萬言書，以變法為言，深受神宗信任，熙寧二年（一〇六九）任參知政事，次年即被神宗拔擢為宰相，以實施新法為務。這場熙寧年間的變法革新，使得王安石在朝政上得以施展抱負，厲行革新，雖然日後史學家對他的做法評價兩極，然而在北宋政壇上，從此留下改革派的鮮明意象。雖然之後與呂惠卿不和，主動辭官返鄉，晚年又歸隱於江寧府鍾山，直至六十六歲時病卒。卒後受封荊國公，世稱王荊公；又因諡號文，故亦

稱王文公。

另一方面，他在文學上的耀眼光芒，亦不輸給他的政治成就，其中散文、詩、詞，皆能自成一家。為文，思慮深闊，然下筆簡勁犀利，頗符合其剛強兀傲的個性，與韓愈、柳宗元、歐陽修、三蘇、曾鞏等人同被列為「唐宋八大家」；詩學杜甫，用字清疏精妙，意境高遠，有《明妃曲》、《桃源行》、《泊船瓜洲》這類膾炙人口的詩作，流傳不絕；詞雖不多，然卻刻意擺脫晚唐、五代的靡豔習氣，以文人

詞，猶有傲然不群的氣勢。

在介甫的著述之中，以宋紹興年間曾孫王珏為其纂輯成編的《臨川先生文集》一百卷，兼散文詩詞之作，最為完備，流傳亦最廣；而在宋人不流行為宋人作注的時代中，唯一將安石的詩作別出、另立成冊，並加以注解的本子，便是南宋李壁作注的《王荆文公詩》。此部《王荆文公詩》流傳甚罕，傳世不多，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此帙不僅為傳世無

二 的宋本，同時亦是現存最早的刻本，其珍稀難得，不在話下。

李壁作注契機

李壁是為王安石詩作注的第一人，其下筆注疏之契機，大抵是源自於壁因政治因素被貶謫至江西撫州，而在他謫寓撫州之餘，因讀撫州人王安石之詩作，每有意會，便提筆記下，根據魏了翁序云：「石林李公，曩寓臨川，耆公之詩，遇與意會，往往



圖一 李壁注《王荆文公詩》卷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隨筆疏於其下，涉日既久，後命史纂輯，固已粲然盈編，特未嘗出以示人也」。事實上，李壁跟王安石相距一個世紀之遙，彼此間更不可能有往來關係，但李壁不僅是替王安石詩作注的第一位宋人，其後無人能出其右；而他所注的王安石詩，更成為後人了解介甫詩作的最佳參考資料。論及此種因緣際會，不免引人好奇，進一步深究原因，或可先從李壁這個人的生平談起。

李壁（一一五九—一二三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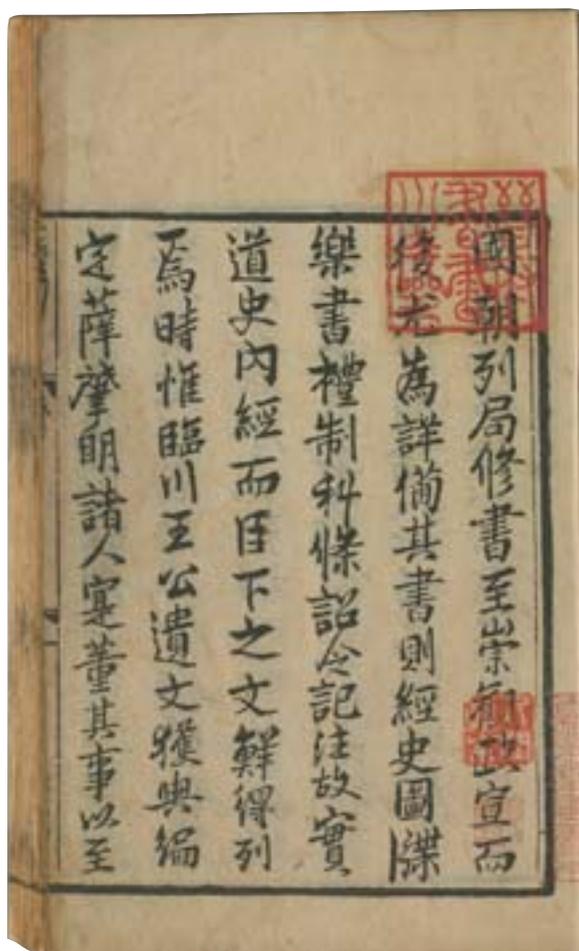
字季章，號雁湖，又號石林，眉州丹稜人，為南宋大史學家李燾之子。其父李燾因自幼目睹靖康之難，憤恨金仇未報，在政壇上表現出深具才幹，性格廉潔無私的一面，但後來為小人浮言所害，罷官歸鄉。巧的是，李壁在寧宗時拜參知政事，因附抗金名將韓侂胄，被提拔至禮部尚書，兼知樞密院。到了寧宗開禧三年（一一二七）時，韓侂胄受讒言伏誅，壁連帶被謫至江西撫州。或許因為政治上的失意，李壁到

了撫州，除了自身頗好詩文的興趣之外，在讀到王安石的詩作時，對於他力倡變法革新的堅持，以及後來遭呂惠卿等小人讒言，憤而辭官歸鄉的心情，正與父親，甚至自己，有著同病相憐的處境，而在不自覺間對王安石產生微妙的孺慕情感，而這種孺慕之情或可以說是源自於對一個在政治上廉潔正直，卻沒有得到合理對待的情感投射。從王安石的詩中，可以感受到他在施政時

的雄才抱負、對百姓的憫人情怀、對歷史人物的褒貶，甚至於生活情趣的觸動，種種豐富有趣的題材，都在李壁注詩的過程中，更加靈動清晰，或許出處典故是李壁注詩的關注重點，但偶有有意會的靈犀，同時也是李壁疏注的特色之一。

詩注之纂輯及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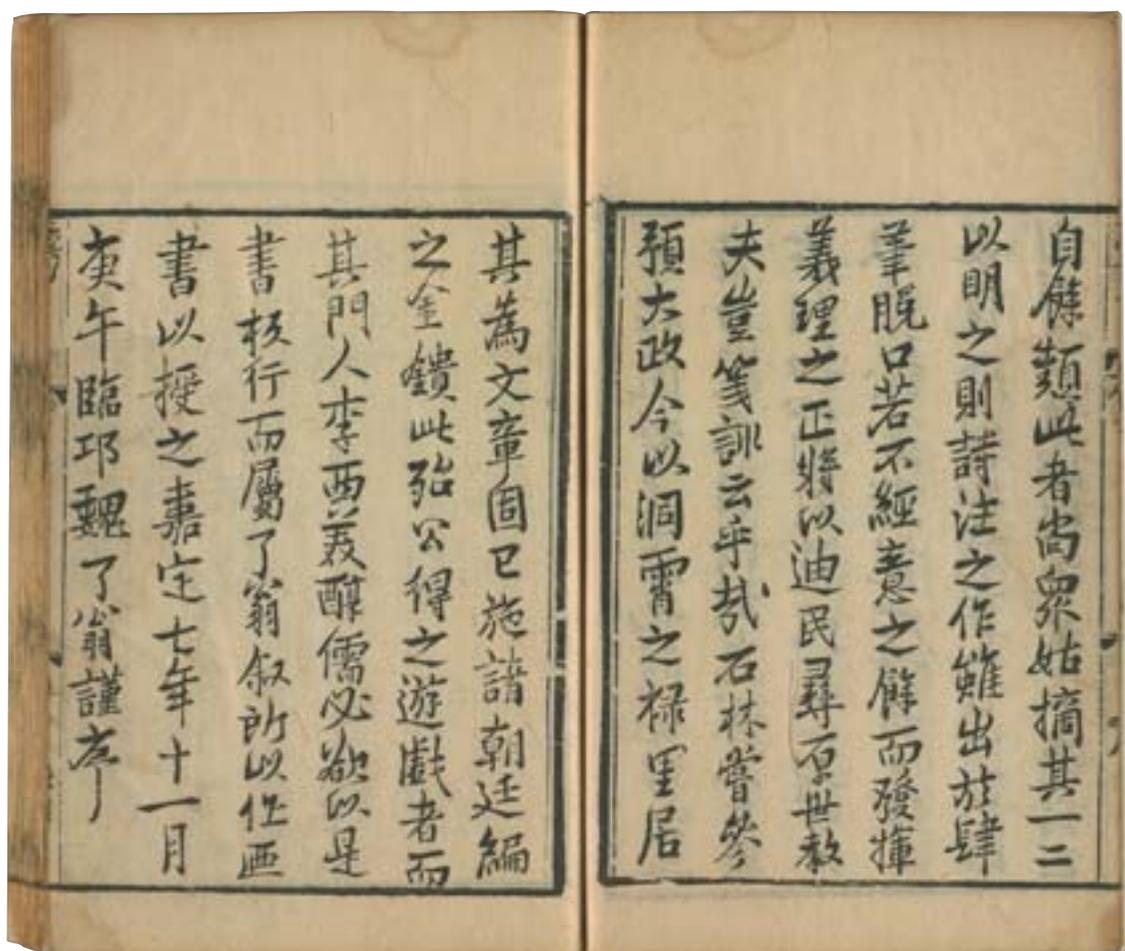
是書纂輯成編，雖不詳費時多久，然待李壁完成後，真正付



圖二 魏了翁序

梓時間為嘉定七年（一一二一四），時壁已屆五十六歲，由壁之門人李西美為之版印，並延請南宋著名理學大師魏了翁為之作序。魏了翁（一一七八—一二三七）曾任工部侍郎、禮部尚書、端明殿學士、資政殿大學士等職，在政治上與李壁立場相同，不僅力主抗金，更獻上邊防十策，後遭奸臣黜退，始居白鶴山下，開館講學，成為理學大師。至於李西美，字醇儒，為李壁門人，然生卒不詳，餘亦未見載錄。

從李壁注王安石詩的內容看來，其考證出處，說明典故，詳實仔細，確可見到壁用功之勤與用力之深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提及壁注，稱其「然大致摭摭蒐采，具有根據，疑則闕之，非穿鑿附會者比。」。而李西美既為門生，出資雕印，撇開李壁個人對自己著述的殷切期盼之情，更重要的是，李西美刊刻此書的用意，在於彰顯業師著作，以此宣示詩禮之學的傳承，亦不言可



圖三 魏序末交待梓印源由

喻。因此對於此書的梓印極為慎重，除了特請魏了翁作序之外，另在是書的字體、刻工、用紙，甚至版面的編排上，亦極為重視，希冀使業師著述為時人所知，甚至千秋永傳。

事實上，此部《王荊文公詩》曾歷四次出版。第一次付梓，為南宋年間由李壁作注，李西美雕版印行，故宮此帙即宋刻本；後來，到了元大德辛丑（五年，一一三一）時，廬陵劉辰翁曾評點王安石的詩，辰翁門人王常以李壁注詩的版本傳世極少，遂將李注刪節，與劉氏評點合刻，為第二次的刊刻；其後，元大德丙午（十年，一一三六），毋逢辰取撫州刻本，結合李壁注與劉辰翁評點，交由福建書坊刊行，此為第三次出版；最後一次，為清乾隆辛酉（六年，一七四一）武原張宗松購得華山馬氏道古堂舊藏元刻本，刪去劉辰翁評點，自行雕版印行，為第四次出版。在這四次出版之中，以宋刊本最為珍罕，僅本院存藏：元大德五年王



圖四 是書卷一末有「補注」及「庚寅增注」，「庚寅」為紹定三年（1230）

常刻本，清末流出宮外，現北京圖書館藏有此部；元大德十年毋逢辰刻本，南京圖書館藏有此部；至於清乾隆六年張宗松清綺齋刻本，為現今數量最多，亦最為普遍的版本。

故宮《王荊文公詩》

《王荊文公詩》原五十卷，故宮此帙僅存十七卷，分別為目錄三卷，內文卷一至卷三，卷十五至十八，卷二十三至二十九，卷四十五至四十七。版式為左右雙欄，每半葉七行，行十五字，注文小字雙行，行亦十五字。版心白口，雙魚尾，中縫上方記大小字數，中記卷次及葉次，下記刻工名，多為南宋中期江浙地區著名的雕工。卷首有嘉定七年（一一二四）十一月庚午臨邛魏了翁序。卷一至卷二十一為古詩，卷二十二至卷五十為律詩。其中古詩收錄四百三十八首，律詩有一千一百六十七首，數量之多，令人驚嘆。

是書保存狀況良好，字體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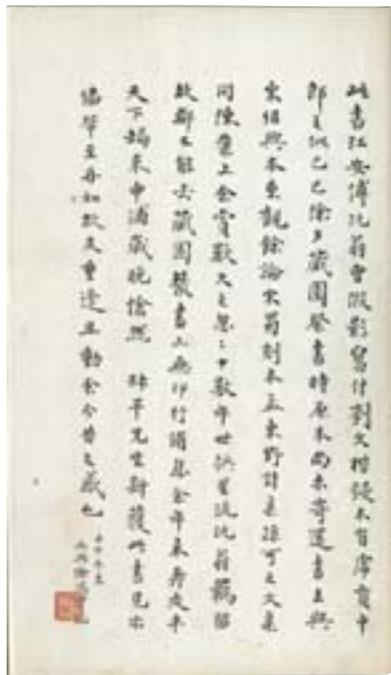


以顏真卿、柳公權風格，有顏體之圓勁渾厚，又結合柳體的骨力秀挺，兼融顏柳兩者之長，刀筆謹嚴。然部份葉次應為後來修補增入，其版式雖大致相同，卻在字體及墨色上略有差異。修補葉次之版心，多有「庚寅換」等字樣，卷末亦有「補注」及「庚寅增注」等字，以墨圍子別出，此

為補充前注未及之處，為後來出現之文字。「庚寅」，為理宗紹定三年（一二三三），距李壁亡故已有八年，此補注及增注文是否出於李壁之手？據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提及此書：「注荆公集五十卷，參政眉山李壁季章撰，謫居臨川時所為也，助之者曾極景建，魏鶴山為作

序。」曾極，字景建，臨川布衣，晚年以江湖集事獲罪，謫道州卒。有人推測，補注及增注文可能是出自曾極，然針對此點，昌彼得先生在考證此書淵源時，認為曾極與李西美一樣，同為李壁門人，主要工作為協同纂輯抄錄之人，故庚寅增注文仍應出於李壁之手，而由曾極協助，並非由曾極增補。

除此之外，是書部份葉次有別於原刻者，乃在於將行格注文原為小字雙行，剞刻成三行；且注文小字字體大小不一，部份注文行款字數未按原刻每行十五字的慣例，有時一行多達十六、七字。視其行格注文之更動編排，推測有可能是在原刻版上再進行加工，將原刻注文小字剞補擠刻，使得後來補刻與原來注文，不僅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，且在編排上亦可看出更動之跡。昌彼得先生《增訂蟬菴群書題識》一書中更據此大膽推測，院藏此帙乃嘉定七年在撫州雕印；至十七年再印時，李西美便將這段期間



圖五 書前扉葉徐鴻實手書題跋

陸續補入的新增注文，根據舊版剝補擠刻後印行；至紹定三年計畫再印時，無法就舊版補入，只有將少數版片抽換重刻，餘則附刻於每卷之末，便有現在印本增補注文的情形。然據王水照《王荆文公李壁注》前言提到清嚴元照《悔庵學文》記載嘗借《王荆文公詩注》殘卷兩冊，書中有胡衍跋，故推測此帙宋刻本有三，分別為嘉定七年李西美本、嘉定十七年胡衍跋本及紹定三年的庚寅增注本。視嚴氏所述，院藏此帙與所見係同一部，由於跋置於卷末，院藏缺末卷，故未見嘉定十七年胡衍跋。

從藏書印及卷前扉葉手書題記觀之，可以看出是書流傳軌跡。書中鈐有「晉府書畫之印」大朱方、「敬德堂圖書印」大朱方、「子子孫孫永實用」朱方、「嘉業堂藏善本」朱長、「曾經南林劉翰怡收藏」朱方、「人間孤本」白方、「張叔平」朱方、「張百熙長壽年宜子孫」大白方、「李氏德圭」白方、「蘇齋」朱長、「德圭」白方、「文章」朱方、「德圭大章」白方、「閻浮過客」朱方、「千息僧逸」朱方、「子木子」朱方。

其中「晉府書畫之印」大朱方、「敬德堂圖書印」大朱方、「子子孫孫永實用」朱方，皆為明晉藩朱鍾鉉所有，此書曾為晉藩府中藏書；到了清末可能傳至嘉業堂主人劉承幹的手中。而後又流落何人？根據書前扉葉有壬午（民國三十一年）冬至吳興徐鴻實手書題記一則，便可稍稍解開此點疑惑。「此書江安傅沅翁曾假影寫，付劉文楷鋸木，有虎賁中郎之似。己巳除夕藏園祭書

時，原本尚未寄還書主，與宋紹興本《東觀餘論》、宋蜀刻本《孟東野詩集》、《孫可之文集》同陳案上。余賞歎久之，忽忽十數年，世換星流，沅翁羈留故都不能去，藏園叢書亦無印行消息。余年來奔走半天下，搗來申浦，歲晚愴然，叔平先生新獲此書見示，繙覽至再，如故友重逢，且動余今昔之感也。」從徐氏題記中，約可看出此殘帙歷民國初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入藏，至抗戰初期散出，後流入某位不知名書主手中，被傅增湘借去影寫，徐鴻實曾經過眼，而後此書又被張叔平購入，因就教於徐氏，於是徐鴻實於書前題跋，以誌此事。之後，張叔平轉贈謝承炳攜來臺灣，末由謝承炳先生捐入本院永久收藏。其輾轉歷劫，存全不易，此刻雖非全帙，然李壁注文完整，未經刪削，遠勝後來元、清刻本的訛奪刪改，其對於考見宋人在學術上堅持博綜詳實的治學態度，深具研究價值，且彌足珍貴。